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450-455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10777

Hans汉斯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张圆圆

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4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9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9日

摘　要

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双重压力，互助养老成为破解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短板的重要模式。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与多中心治理视角，剖析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社会学逻辑与现实基础。研究表明，在“熟人社会”变迁背景下，该模式面临传统网络弱化致使内生动力不足、资源高度依赖外部输血、组织规范化滞后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衔接阻滞等系统性困境。为此，本文提出重构乡村社会资本以激发内生动力，完善多中心治理框架拓宽资源供给，推进组织规范化建设，并引入“时间银行”机制强化制度激励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效能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关键词

农村互助养老，社会资本，多中心治理，时间银行，熟人社会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Optimisation Paths for the Rural Mutual Aid Model for Elderly Care

Yuanyuan Zh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June 24, 2026; accepted: October 1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9, 2026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dual pressures of an increasingly ageing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family's role in providing care, mutual aid in elderly care has emerged as a key model for addressing shortcomings in the provis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Drawing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a multi-centr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ociolog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rural mutual aid model for elderly car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against the

文章引用: 张圆圆.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450-455.
DOI: 10.12677/ar.2026.1310777

backdrop of changes in "familiar-acquaintance societies", this model faces systemic challenges such as a lack of endogenous momentum due to the weakening of traditional networks, a high degree of reliance on external resource transfers, lagging organisational standardisation, and difficulties in integrating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ptimised pathway involv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to stimulate endogenous momentum, the refinement of a multi-centred governance framework to broaden resource supply, the advancement of organisational standardis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 "time bank"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mutual care services.

Keywords

Rural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Social Capital, Polycentric Governance, Time Bank, Acquaintance Socie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与人口结构的深度转型，我国农村地区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与空心化交织的严峻态势。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土地养老功能日趋衰退，而正式的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因边际成本较高及资源配置错位，难以全面覆盖广大农村地区。在此背景下，依托地缘与血缘关系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村互助养老进行了广泛探讨，部分学者从互助性养老服务的现实困境、结构缺陷[1]与半市场化统筹[2]的视角分析了互助养老的外部环境；也有学者如汪龙鑫等[3]从结构－行动视角、王传发[4]从行政嵌入与村社自主的张力视角，探讨了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困境。也有学者基于基层政府双重注意力分配[5]以及农村内生型养老服务市场建设[6]等视角，剖析了互助养老模式在资源动员和市场机制引入层面的制约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的制度或组织层面，未能充分揭示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对互助模式底层逻辑的系统性冲击，且在多中心协同的利益博弈分析上着墨较少。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系统审视农村互助养老的理论逻辑。尝试将"社会资本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深度结合，精准识别其在"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型中面临的系统性困境，并探索科学有效的优化路径，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2.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社会学逻辑与现实基础

2.1. 农村互助养老的内涵界定与模式分类

农村互助养老是基于农村特有的地缘、血缘与业缘网络，以村级自治组织为依托，由农村老年人、低龄健康老年人及留守妇女等群体，通过劳务交换、精神慰藉、资金统筹等方式，实现互惠共济的一种非正式或半正式养老服务供给机制[7]。从资源配置与组织形态的维度考察，当前的农村互助养老主要呈现出集中互助与分散互助两种基础形态。集中互助模式通常表现为村集体整合闲置公共资源设立"互助幸福院"或"日间照料中心"，提供统一的餐饮与娱乐服务；分散互助模式则表现为邻里间的"结对帮扶"与"低龄反哺高龄"的居家照护网络。此种分类不仅反映了农村场域内资源禀赋的差异，也构成了

不同地区选择适配养老策略的实践基础，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分类及特征要素见表 1 所示。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analysis of rural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models
表 1.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分类及特征要素分析

模式类型	空间载体	核心主体	资源配置方式	适用情境
集中互助型	互助幸福院、村级活动中心	村委会、老年协会	外部资金注入与村集体资产盘活为主	集体经济较好、居住相对集中的行政村
分散互助型	老年人居家住所	邻里、亲属、低龄老年人	劳务置换、时间储蓄与非正式情感回馈	居住分散、地形复杂或集体经济薄弱地区
混合互助型	居家与社区设施结合	多元主体协同	内外资源嵌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协同	具备一定社会组织培育基础的城郊村落

2.2. 互助养老模式的社会资本理论基础

社会资本理论是解析农村互助养老运转机理的核心分析工具，在帕特南的理论框架中，社会资本表现为网络、信任与规范，这些要素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乡村社会资本在养老领域的具象化变现。首先，高密度的社会网络是互助养老的信息传递渠道与组织载体，使得养老需求能够被快速感知并作出响应。其次，基于长期重复博弈形成的特殊信任，构成了互助行为的信用担保，降低了服务交换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最后，乡村社会中关于互惠互利、尊老敬老的非正式规范，对村民的行为产生内化约束与道德激励，确保了互助养老中“延期回报”机制的有效运转。

2.3. “熟人社会”变迁对互助养老供需结构的冲击

“熟人社会”构成了传统农村互助养老的场域基础。然而，伴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市场经济的渗透，传统农村正经历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乃至“理性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这一变迁直接导致互助养老供需结构的失衡。在需求侧，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导致农村家庭代际居住分离，老年群体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需求呈指数级增长。在供给侧，“半熟人社会”削弱了原有的差序格局与村落认同，村民的行动逻辑逐渐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让渡，传统基于道义的无偿互助意愿显著降低。供需两端的张力，使得原本自洽的内生型互助养老系统面临严峻的解构危机。

3.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3.1. 传统社会网络弱化下的内生动力不足

内生动力是维持互助养老系统自运转的核心要素，当前农村互助养老面临的首要困境在于传统社会资本流失导致的动力衰退。一方面，原子化趋势使得村落共同体意识淡薄，邻里互助的伦理基础被弱化，提供无偿或低偿养老服务的意愿持续走低；另一方面，作为互助服务主要供给者的“低龄老年人”群体，自身也面临着隔代照料(抚育孙辈)与农业生产的双重压力，导致其参与互助养老的时间与精力被严重挤占，难以有效实现“老有所养”与“老有所为”的有机结合[8]。缺乏稳定的参与主体与持续的互惠预期，互助养老易沦为行政指令下的“面子工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生动力衰退在不同场域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根据李翌萱等学者[9]等对关中农村的调研，在西部欠发达山区，深度“空心化”是主因，近七成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村庄内部留守老人极度缺乏互助的人力资本；而在东部沿海或城郊村落，尽管人口密度较高，但受市场经济高度渗透影响，“工具理性”占据主导，传统的邻里互助多被“有偿服务”替代，无偿互助意愿降至冰点。

3.2. 多中心治理缺失下的资源依赖性困局

在资源统筹层面，农村互助养老陷入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与单一供给困境。从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视角来看，公共事务的治理应依赖多主体的资源协同。然而，现实中的农村互助养老呈现出高度的“政府依赖”与“村集体兜底”特征。建设资金与运营补贴高度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一旦外部资金断裂，互助设施往往面临停摆风险。同时，由于缺乏合理的商业模式与产权界定，市场资本缺乏进入农村互助养老领域的激励；而专业的社会组织(NGO)受限于农村基层的封闭性与资金匮乏，亦难以有效介入。多中心主体的缺位，导致互助养老模式的抗风险能力极弱。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各主体间存在显著的利益冲突与协同壁垒，从市场主体来看，农村互助养老具有强烈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加上村集体闲置资产产权界定模糊、老年群体消费支付能力低下，导致市场资本缺乏足够的盈利预期与投资激励。基层往往陷入“越位”与“缺位”的矛盾中：一方面在前期建设中“大包大揽”形成行政依赖，另一方面在后期运营监管中又因精力不足而“缺位”。此外，专业的社会组织(NGO)受限于农村熟人圈子的排他性与自身筹资困难，难以与村两委建立平等的合作信任关系，往往被边缘化。至此，由宏观变迁与中观场域转型共同交织作用、涵盖非正式与正式制度层面的农村互助养老困境生成机制基本显现，具体生成路径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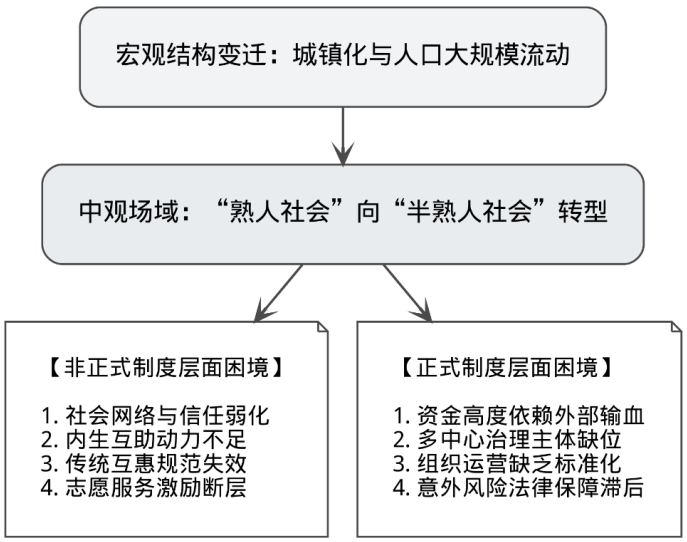


Figure 1.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dilemma of rural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models
图 1.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困境的生成机制

3.3. 组织规范化滞后导致的运营效能弱化

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的非正式属性决定了其在运营管理上的粗放性，由于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与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互助养老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效能问题。首先，服务内容呈现碎片化与浅表化，多停留在简单的聚餐或娱乐层面，难以满足失能或半失能老年人深层次的医疗护理与心理干预需求。其次，准入与退出机制模糊，导致服务对象的筛选与服务质量的评估缺乏量化标准。此外，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成为制约互助养老深化的致命弱点。在实践中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缺位与责任划分不明，互助养老极易陷入“好心帮忙、意外受伤、自担损失”的法律与信任困境。如果高龄老人在日常被照料中意外摔伤，由于缺乏意外险保障和法定责任豁免条款，帮扶者或村集体可能会面临人身损害赔偿。这种“好心办坏事”的意外不仅重创了乡村熟人社会的信任网络，更引发了互助主体的畏难退缩心理(即寒蝉效应)，导致部分互助点被迫停摆。这一风险已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在专项指导意见中明确将规避此类人身伤害纠

纷、探讨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作为推动互助养老发展的核心制度保障。

3.4.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衔接的机制阻滞

农村互助养老的理想运行状态应是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乡村非正式制度的有机嵌合，但当前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衔接阻滞。一方面，国家层面出台的养老服务政策多以城市社区或机构养老为蓝本，其考核指标与监管体系难以向下兼容具有高度非正式性的农村互助网络。另一方面，针对互助养老中的“劳动价值核算”，缺乏统一的制度认证机制。互助提供者付出的劳动无法在更大空间(如跨村镇)和更长时间(如跨代际)维度上得到正式机构的信用背书与兑换保障。这种制度隔阂不仅限制了互助模式的规模化扩展，也削弱了其政策合法性基础。

4.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优化路径选择

4.1. 重构乡村社会资本：激发互助养老内生动力

破解动力不足的核心在于对乡村社会资本进行存量激活与增量重构。其一，需重塑新型村落认同。通过挖掘传统乡贤文化与孝道伦理，结合现代文明实践活动，强化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将“互惠互助”重新内化为乡村公共道德规范[10]。其二，构建异质性社会网络。打破传统局限于宗族内部的封闭型互助，依托基层与村委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建立跨越血缘与地缘的广义村民互助群。其三，强化制度性信任。在传统人际信任流失的背景下，必须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互助账目公示制度与服务评价体系，以契约精神补足情感信任的缺口，确立基于规则的制度性信任，从而夯实互助养老的社会心理基础。其四，固化社会资本重构的契约载体。在实践中，应在乡镇人民政府指导下，由村民会议讨论制定“互助养老专项公约”，或将权责边界与纠纷仲裁条款直接嵌入“村规民约”中，以确保公约具有群众基础与自治效力；同时设立由村干部与乡贤组成的“互助理事会”作为常态化监督主体，配合月度互助积分张榜公示机制，将无形的信任网络转化为可视化的治理绩效，以制度刚性约束“搭便车”行为，形成稳定的内生激励闭环。

4.2. 完善多中心治理框架：拓宽资源协同供给渠道

为摆脱单一路径依赖，必须构建政府、村集体、市场与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跨界协同治理框架。政府的职能应由“直接供给者”向“规则制定者与平台赋能者”转变，避免过度行政干预导致的“越位”，同时通过建立互助养老标准体系、购买服务与设立风险兜底基金避免“缺位”。村集体需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盘活村内闲置土地与宅基地资源，转化为互助养老的物理空间。同时，创新资源导入机制，破解市场资本的营利性难题。例如，可推行“产业 + 互助养老”模式，将互助养老设施与乡村文旅、特色农产品展销相结合，以产业反哺养老，赋予市场主体一定的特许经营权或税收减免以激活其内生动力。此外，应积极引入具备专业社工背景的社会组织(NGO)，明确村两委与 NGO 的“契约型合作”关系，由其负责志愿者的招募、培训与督导工作，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与管理专业化的有机统一。

4.3. 推进组织规范化建设：提升非正式网络服务效能

非正式互助网络的持续存在必须以一定程度的规范化管理为保障。首先，应推行服务清单制管理。根据农村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与实际需求，将互助服务划分为生活照料、医疗辅助与精神慰藉三大类，并设定分级服务标准。其次，强化从业者的能力建设。由乡镇卫生院或专业社会组织定期对参与互助的低龄老年人及志愿者进行基础护理与急救知识培训，提升服务供给的技术含量。最为关键的是，建立健全风险分担与责任豁免机制。由地方政府或村集体出资，统一为互助服务提供者与接受者购买“互助养老意外伤害险”，并通过村规民约或协议形式明确责任边界，免除志愿者的后顾之忧，从制度层面阻断风

险扩散。此外，须构建全流程的服务监管与动态评估体系。依托村级互助设施或社工站，为受助群体建立“一人一档”的健康与需求信息电子台账，严格执行服务轨迹的留痕管理。同步设立由受助者家属、村级干部与第三方社工构成的联合督导组，定期开展服务质量的量化考核，并据此执行互助主体的准入审批与劣汰退出机制，从而将粗放式的熟人帮扶实质性转化为可度量、可追溯的标准化服务流程。

4.4. 强化制度衔接与激励：完善志愿服务的时间银行机制

化解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衔接阻滞的突破口，在于建立具有公信力的价值交换中介，即引入并本土化“时间银行”机制。第一，建立区域互认的信用流转系统。依托数字乡村建设，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时间银行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服务时长的精确计量、不可篡改与跨区域结算。第二，拓宽时间积分的兑换维度。除了传统的“时间换时间”(即现在服务他人，将来享受服务)，应引入“时间换实物”与“时间换公共服务”的即时激励机制。例如，互助积分可兑换村级超市的生活物资，或优先获取农业技术指导。第三，探索代际转移与继承机制。允许志愿者将积累的时间积分转移给异地居住的父母，以此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构建起宏观层面的社会化互助循环圈。

5. 结语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挑战、契合农村本土特征的内生型制度创新。该模式的健康运行深度嵌入于乡村社会资本与治理结构之中。面对“熟人社会”解体带来的内生动力衰退、资源供给单一、组织运转非标及制度衔接断裂等系统性困境，单纯依靠外部行政力量的干预已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重构乡村社会资本为底层逻辑，以多中心治理为架构支撑，以组织规范化为运行保障，并创新性地植入“时间银行”等激励机制，推动非正式互助网络与正式制度框架的深度融合。唯有如此，方能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提质增效，为广大农村老年群体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养老服务安全网。

参考文献

[1] 陈友华, 尹曦粲. 互助性养老服务的现实困境、结构缺陷与发展反思[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6(4): 94-105.

[2] 袁明宝, 吴欢欢, 刘芳. 半市场化社区互助养老: 农村老年人照料中的集体统筹与实践定位[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1): 61-72.

[3] 汪龙鑫, 钟丹, 陈涛. 重构社会基础: 结构-行动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的行动逻辑[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6): 172-181.

[4] 王传发. 行政嵌入、村社自主与乡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基于中西部乡村的多案例比较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6(1): 103-114.

[5] 王传发. 双重注意力经营视角下乡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机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5, 24(4): 614-622.

[6] 杨雪晶, 杨秀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内生型养老服务市场建设与政策启示[J]. 农业经济, 2026(6): 92-94.

[7] 李新瑜, 朱礼华, 付晓艳. 基于村社统筹的农村互助养老供给模式分析[J]. 农业经济, 2026(5): 102-104.

[8] 王辉, 陈筱媛. 以农村互助养老促进老有所为: 内在机制、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26(4): 26-47.

[9] 李翌萱, 蒋美华.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支持体系的多元整合与优化——基于关中农村 9 所互助院的调研[J]. 中州学刊, 2020(6): 83-87.

[10] 甘颖. 农村互助养老共同体的多元建构模式及其实践[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43(3): 74-82.